

陈支平 万明 主编

明朝 在中国史上的地位



天津古籍出版社

明朝在中国史上的地位

陈支平 万明 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明朝在中国史上的地位 / 陈支平, 万明主编.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80696-950-2

I. ①明… II. ①陈… ②万…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明代 IV. ①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37844号

明朝在中国史上的地位

陈支平 万明 / 主编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河北省欣航测绘院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0.25 字数 660 千字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6-950-2

定 价: 88.00元

前言

陈支平 万明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断代史研究，取得了许多引人瞩目的成果。明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阶段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理应引起人们更多的足够重视。

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中国古代史的上半部分，由于先秦考古资料的不断涌现、秦汉简牍的次第发现、敦煌文书的重新整理，许多上古、中古时期的历史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与解释。而在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的进步、文化的繁荣、政治的变革，以及极其多样化的民族关系等，使得当代的学者们倾注了众多的研究热情，形成了诸多的创新见解。即使是清代的历史，也因其年代之相近、发展脉络与当今社会关系的千丝万缕，倍受学者乃至社会大众的关注。反观明代历史的研究现状，似乎处于历史学的夹缝之中，两不相靠，相对沉寂了许多。

中国的各个断代史之所以让现代的学者们倾心不已，就在于他们各有其与众不同的内涵与特色。明代的历史也是如此，它正处于东西方变化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就国内的情景而言，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经济与文化，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意识形态等都有许多新东西、新因素。而从世界史的进程来看，西方各国也正从自身的“区域史”向“世界史”迈进。如果把明代的历史放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考察，明代历史是中国历史从“区域史”迈进“世界史”的关键时期。对于早期的西方殖民者，此时的中国从思想文化到社会经济与国际贸易，乃至军事对抗，均能采取比较积极的应对姿态。这种趋势应当成为我们认识明代历史地位的最主要标志。因此，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视野来审视明代的历史，明代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更是显得至关重要，不容忽视。深入开展对于明代历史的研究，是中国明史学界责无旁贷的任务。

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的同志们，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人文学院，以及台湾明史研究会的好友们，在共同学术追求的促动下，走到了一起，于2010年6月24日至28日在厦门大学召开了题为“明史在中国

史上的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学术月刊》编辑部、天津古籍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故宫博物院的学者和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的海内外50余名学者共同参加了本次会议。中国明史学会商传会长和台湾明史研究会徐泓前理事长分别在会上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会议以“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明代历史对世界文明进展的影响”作为主要议题，收到与会学者提交的30多篇论文，涉及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族群关系、中外交流等诸多领域，从基本预设、思考向度、问题设计、理论性话语等角度，探讨了将明史研究向纵深推进的可能。

这次会议，只是中国明史学界推进新时期明史研究的一次尝试。与会者一致呼吁：从2011年开始，这种有着深度学术探索意味的研讨会，有必要定期举行下去。每次会议，集中讨论一至两个问题，循次以进，终将取得突出的成果。为此，我们要求参加此次会议的学者们回去认真修改自己的论文，汇总之后予以结集出版，在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这一愿望很快就得以实现。

我们愿把这本明史探索性的文集，呈现给所有关心明史研究的同仁们。由于时间仓促，书中所存在的错误在所难免。我们除了敬请各位方家予以批评指正之外，更希望以此作为新时期深入开展明史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

目 录

•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 徐泓	1
• 明文化：未完成的近代化转型 / 商传	8
• 从诏令看明帝国的特性 / 万明 ——法制史视角的重新审视	16
• “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 / 赵世瑜 ——明清易代的区域社会史解释	30
• 论元明之间的变革 / 李新峰	46
• 成弘之际的“盛”与“变” / 刘婷玉 ——作为转折时期的成化、弘治时代	74
• 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 / 陈支平	92
• 晚明社会的历史反思 / 张海英	99
• 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 / 范金民 ——郑和下西洋	105
• 明史以外看明史 / 赵轶峰 ——关于明史研究范式的几个问题	129
• 从地方官的“表演”论明清地方统治的实态 / [日]山本英史	135
• 明代民事诉讼程序的再考察 / 阿风 ——以徽州诉讼文书为中心	141

• 明代对传统荒政的继承与完善/ 张兆裕	163
• 吕坤的“定分”思想及其务实政治/ 解扬	175
• 劳堪案始末考/ 江柳青	187
• 政治宿求与理学气节/ 张宪博 ——东林党人讲学考	214
• 论明代讲会的规模/ 陈时龙	267
• 新作物与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 [韩]元廷植 ——以福建烟草为中心	275
• 海洋经济与明清闽南山海联动/ 王日根	288
• 对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林枫 孙杰	295
• 三个明代卫所军户的个案考察/ 张金奎	301
• 明代嘉隆年间长城图籍撰绘考/ 赵现海	322
• 明代“遮洋总”考/ 王尊旺	342
• 项忠与明代关中水利/ 钞晓鸿 ——兼论人物传记中的水利史料	358
• 江南姚廷遴家族的环境与日常生活(1628—1697)/ 佳宏伟 ——基于《历年记》的分析	374
• 从归附人视角看明朝民族关系/ 奇文璞	390
• 忠顺的历史：明代华北内迁民族社会角色演变论略/ 彭勇	405
• 明中叶的流民与南方山区的开发/ 周雪香 ——兼论“客家”名称的出现	421
• 论明宣宗崇奉密教/ 何孝荣	438
• 从台湾信仰文化凸显明史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 高致华 ——以“开台圣王”与“开漳圣王”信仰文化为例	455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徐 泓

一、过去一般的恶评

对于明朝历史地位的评价,当然不会有人再为推崇清朝的功德,而抹杀明朝的显著成就,如谢国桢所说的:压缩或削减明朝的武功和疆域,轻视明代的学术思想,认为是极为肤浅,徒尚空论,著作诸书是“小说害事”,但恶评仍有不少^①。

1. 黑暗的时代:长期以来,明代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代,君主专制,宦官滥权,特务荼毒,朝士或热中党争,或专心贪黩;苛捐重税,地主乡官横行乡里,欺压人民,士人苦闷,或逃于空谈心性,或沉于奢靡淫逸;终致民变四起,国家灭亡,为清朝所乘,真乃“天崩地解”之“亡天下”。

2. 没有多少特点的朝代:比较秦汉隋唐宋,无论典章制度建设,还是文治武功,都缺少足以夸耀的业绩,甚至显得黯然失色^②。

3. 停滞的社会:长期停滞的传统中国社会(或称封建社会)的晚期,本身却无克服停滞性的能力^③。虽处于前近代走向近代的前夕,却是造成近世中国没落的关键^④。

二、近年来的共识:正面论述渐多

汉民族为主所建立的最后一个传统中国王朝,其支配体制与文化特质为清代所继承,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国及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前,传统中国社会(或称封建社会)发展的

① 谢国桢:《对于研究明清史的一点体会》,《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第21—23页。

② 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中国通史·明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3页。

③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谢祖钧译,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云:“中国似乎长期停滞不发展了。五百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曾对它的耕作、制造业以及众多的人口作过详尽的描述,然而它们与今天到过中国的旅游者的描述还几乎相同。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之前,中国的财富就已经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许可达到的程度。”

④ 胡秋原:《论近世中国之没落》,《民主评论》1959年第1.2.3.4.5期,第10卷;傅衣凌:《论明清社会的发展与迟滞》,《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收入于《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131页。

最后阶段,最成熟,甚至是烂熟的阶段^①。尤其明太祖开国规模及其典章制度,为后代论者所赞扬,顺治皇帝就认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②。但这些明太祖定下的制度,成为后代遵循不改的“祖制”,不能顺应时代环境的变迁而修正;僵化的祖制是后世论者认为15世纪以后中国逐渐落后西方的原因。

与清朝共同奠定现代中国版图,汉族人口大量向西南边疆迁移,建立正式行政组织,真正把云贵纳入中国版图,东北、蒙古、西藏亦在帝国羁縻范围之内。闽、粤人民大量向南洋发展,国力重心南移,而为近世中国开新基运^③。

彻底确立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体制,丞相废除之后,外廷最高权力层消失,内廷的皇权及其代理人——宦官权力高涨。外廷若欲有为,必须与宦官合作;而有“权相”与“阉党”出现。黄宗羲因此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明夷待访录·置相》)

不论赞成明清社会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论者都不再认为其社会与经济是停滞的,都承认明代农业与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网络流通,海外贸易兴盛,白银大量因出超而流入;租税朝纳银化发展,人身控制体制松懈,社会空前繁荣,社会风气朝着僭奢变迁,社会流动加速加大。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兴起,尤其庶民阶层与商人阶层地位日渐重要,识字人口增加,展现庶民文化面貌的小说、戏曲及实用科技大为发展;贴近百姓日用的王学,大行其道。可以说明代文化在综合、普及和反传统方面均有创造性的贡献^④。

三、存在的歧见:评价问题

(一)针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新停滞论

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盛极一时,向停滞论宣战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述,西方学者甚不以为然,而于1964年9月6—12日在英国南部Ditchley Park, Oxfordshire,由《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社主办《中共史学研讨会》(Conference on Chinese Commu-

① 田村實造:《最後の東洋社會》,中央公論社1969年版;岩見宏、谷口規矩雄:《伝統中国の完成 明・清》,(東京:講談社1977年版,“序章——爛熟した中華帝国”;寺田隆信:《落日の大帝国》,集英社1982年版。

② 《清实录》第3册,卷71,顺治十年正月丙申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6b—17a页。

③ 吕士朋:《明代在国史上的地位》,《东海大学历史学报》1978年第2期,第1—14页;毛佩琦:《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钱穆:《国史大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532页。

④ 刘子健:《明代在文化史上的估价》,《食货月刊》复刊1986年第15卷第9、10期,第5—8页。

nist Historiography), 评论资本主义萌芽, 其结论为大多数西方学者所认同^①。不赞成传统中国社会的明代有资本主义萌芽, 几乎成为西方史学界的共识, 连美籍华人学者大多也持这种看法, 黄仁宇是最典型的一位, 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余英时也在《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特质的一些看法》(《历史与思想》, 台北: 联经出版社 1984 年版) 中说: 若没有西方的冲击, 中国社会仍会在自己的传统内演变下去, 出不了“资本主义”。原来不认为当时的社会与经济是停滞的共识, 就有了歧见, 有的说中国社会经济是“不发展的发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②, 有的说中国社会经济只有量变的“成长”(Growth), 没有质变的“发展”(Development)^③。70 年代伊懋可 (Mark Elvin) 更提出近代中国农业虽高度发展, 但其收益都被过多的人口所吞噬, 造成“高水平均衡的陷阱”(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④。因此, 只有引进新技术和投入更多的资金, 才能打破这个停滞的恐怖均衡, 跳出陷阱。在那个时代似乎靠自己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只有采开放政策, 引进外来的科学技术与外来的经济制度, 才有希望。无奈当时的中国自满于内部的繁荣, 对外采闭关政策, 明清之际, 基本上, 拒绝西方传来的科学技术。一个内

- ① Albert Feuerwerker (费慰恺) 先后发表两篇论文, “China's History in Marxian Dres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6 (January 1961): 323-353. 与 “China's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 China Quarterly* 22 (1965): 31-61. 后来这两篇论文都收入费慰恺自己编的 *Albert Feuerwerker, ed.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68). 费慰恺引用苏联史家的评论, 认为大陆史家采取“教条的, 反马克思主义的, 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观点”, 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It will be evident to a reader of historical works produc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 this article, in the choice of subject-matter and in its treatment, is decidedly influenced by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tical “li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Government. This is a relative matter, not absolute, but I would suggest that the dominant “class viewpoint” of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Peking regime which produced an anonymous history of dynasties without “feudal” emperors or bureaucrats, literature minus the landlord-scholar-official literatus and nameless peasant rebellions as the central matter of China's history, was to a degree correlated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nal consolidation of power which may more or less be said to have been accomplished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llectivisation of agriculture. The more recent “historicist” trend, which while not rejecting entirely its predecessor concentrates on what may be “positively inherited” from the “feudal” past, represents a quickening of Chinese nationalism fanned to a red-hot intensity, one cannot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conjecture, by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quarrel with the Soviet Union. Soviet Russian commentary on rec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or example, accuses the Chine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dogmatic, anti-Marxist and openly nationalistic and racist views.” The Chinese, for their now relatively favourable view of the thirteenth-century Mongol conquests (which are seen as calamitous by the Russians and other Europeans), for their claim that Chinese “feudalism” is the classical model of this historical phenomenon, and because they exaggerate the role of Confucian idea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Western philosophy, are roundly condemned by the Russians for “bourgeois nationalism”)
- ② Victor D. Lippit,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China: An Afterword,” *Modern China* 6:1 (Jan. 1980): 86-93. Marie-Claire Bergere,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Chinese underdevelopment,” *Theory and Society* 13:3 (1984): 326-337. 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年版。
- ③ 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 ④ Mark Elvin, “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ies,” in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ed. W. E. Willmot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37-172.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298-315.

向和非竞争性的明帝国^①,虽有商品经济与启蒙思想,但相较于西方自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与资本主义等近代文明新发展的历程,明朝相对来说是停滞的,是没有自力救济能力的。这意味着传统的内变是苍白无力的,只有靠外力介入,输入新科学、新技术、新的经济体制,中国才可能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进入近代社会。70年代以来,这种新停滞论几乎所向披靡,成为史学界的主流。台湾“中央”研究院在1977年举办《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与会的中外学者几乎一致为“高水平均衡的陷阱”喝彩和做注解^②。甚至大陆学界在改革开放以后,资本主义萌芽论也逐渐退场,而由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取代。许多学者的论调似乎已逐渐向西方靠拢,连撰述总结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吴承明^③,近年来似乎已不再提资本主义萌芽了。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晚明社会转型的集体研究项目,及明史学会张显清会长主编的《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以“重新肯定明代后期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出发,“从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研究明后期的社会变迁,并提出所谓“时代变迁史”的概念^④。实际上,对过去半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却未能正面迎击,并提出明确的定义与看法;这使书中虽有资本主义萌芽式的陈述,却不见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应有的辩证,未能产生重新肯定资本主义萌芽的预期结果。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夭折的原因,一般仍以明清改朝换代来解释,而归咎于清朝的政策,这并没有脱离过去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窠臼,也不能解决理论的吊诡,何以在晚明已出现的各种社会经济发展的面向,经过清初的沉寂后,到清中后期还是重新展露新芽;似乎对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调,强有力的反击,至今尚未出现^⑤。

(二)明代后期是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

黄仁宇是反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主要学者,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是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已经展开的情况下,挟着轮船和新式武器,才能够以技术补助长距离之不及,以极紧凑的组织克服数目上的劣势。黄仁宇认为中国主张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把资本主义误解为“有好几个人赚了很多钱”。似乎他认为明代社会与经济没有什么新生事物;因此,不能与西方近代文明相提并论,于是他进一步主张晚明是“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⑥。可是许多学者不以为然,认为黄仁宇的说法受“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c)的影响。晚近以来,傅衣凌、杨国桢与陈支平运用70年代西方学者解

① 黄仁宇:《明代史和其它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食货月刊》1986年第7、8期复刊第15卷,第1—15页;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14章,台北:联经出版社1993年版。樊卫国:《论明清经济演进的内向化倾向》,《学术季刊》2002年第2期。

② 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77年版。

③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 张显清:《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河北学刊》2008年第28卷第1期,第63—67页;张显清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⑤ 曾美芳:《评张显清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明代研究》2010年第14期。

⑥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15章,台北:联经出版社1993年版。

释工业革命前欧洲社会经济的“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理论^①,来检验明代的中国,认为尽管没有显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却也是一场中国式的“原始产业化”和“传统内变”^②。另外,王国斌、彭慕兰等虽未直接而明白地触及黄仁宇的理论,但他们想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努力,及主张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与欧洲的发展水平相差有限,意味着他们不会完全赞成黄氏的说法^③。而一些关说明代后期社会与文化的学者,则以具体的实证研究,阐明晚明社会的转型与文化的发展;参与张显清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的9位作者中,有7位从各个面相论述晚明的思想、文学、科技、文化与社会风气、社会转型的互动关系。而另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年学者卢兴基,则以其30年来研究晚明文学与艺术累积的成果,提出晚明的文明是“一段失落的文明”,是“失落的文艺复兴”,是“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④。他与许多研究明史的学者一样,也把这个自“16世纪开始的启蒙,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能与西方同步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运动”,为什么会夭折的原因,归咎于清朝的统治^⑤。这似乎与长久以来的一些学者认为晚明发展的近代思维挫折于清朝入关后的文化政策,如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的主张,前后相呼应,但这个解释的有效性,似乎仍待进一步深入探讨^⑥。

四、结 语

正如许多学术论争的论题一样,有各种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论者常因时因地因人而采不同的看法,作不同的评价。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也可能采不同的看法,作出不同的评价。尤其像明代这么复杂多元的转型时代,新生与旧有的事物杂陈;对这个

-
- ① 参见王加丰:《原工业化:一个被否定但又被长谈不衰的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F. F. Mendels,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 (1972): 241-61. 其实 Industrialization 包含了农业、工业等产业,则 Industrialization 似乎应该译作“产业化”;所以依 Mendels 的原意,Proto-industrialization 译为“产业化的初阶”较“原始工业化”妥切。
- ② 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中国通史·明史》,“前言”,第4页;陈支平:《明代后期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思考》,《河北学刊》2008年第28卷第1期,第70—72页。
- ③ Roy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④ 卢兴基:《失落的“文艺复兴”: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 ⑤ 毛佩琦为此说之代表,详见毛佩琦:《明清易代与中国近代化的迟滞》,《河北学刊》2008年第28卷第1期,第72—75页。
- ⑥ 卢兴基:《失落的“文艺复兴”: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第433—444页;岛田虔次:《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维の挫折》,东京:筑摩书房1949年版;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开》,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版。陈梧桐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刘志琴:《晚明社会与中国文化近代化》,《河北学刊》2008年第28卷第1期,第67—70页;许苏民:《人学史观视阈下的中西大分流》,《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第119—128页。

时代的历史地位,更会产生许多不同的评价^①。清朝初年,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强调其政权的正统性及得国之合理性,当然要贬低明朝。清末,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政府,就强调明朝“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功。民初,国人为图富强,以为追求近代化,非与传统割裂不可;于是晚明反传统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及其作品,备受赞扬。国共斗争时,明朝政治又被赋予现实政治意义,被反国民党人士视为特务政治之典型,朱元璋被视为蒋介石师法之典范,而为屠杀土人臣民之刽子手;张献忠、李自成农民军也因此被比附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②。但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就提醒吴晗,不要只批判朱元璋,也要注重朱元璋的开国创建明朝,恢复生产力之功^③。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加强民族自信心,抵抗“美帝”的围堵,而强调传统中国即使“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没有外力的帮助,仍可以自力更生,发展出具近代性的资本主义,虽然脚步可能缓慢一点;因为我们在明清时代,中国已有自己的资本主义萌芽了^④。而80年代以来,尤其到本世纪初,一向看衰中国的西方学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繁荣,和平崛起,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渐看好看涨;于是,过去一直受恶评的明代翻了身,晚明的中国被认为是十六七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那时候的江南,经济发达,社会繁荣,文化优雅,是令今人向往的生活时空。

其实历史还是历史,事实还是事实,只因明代的多元与复杂,遂使不同时空的人,能够各取所需,自圆其说。即使历史学工作者也难例外,但历史学工作者的职业伦理与常

①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王天有、高寿仙:《明史——一个多重性格的时代》,三民书局2008年版。

② 1944年岁次甲申,为李自成进京与崇祯殉国三百周年,正当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势力大涨,直逼国民政府,有夺取政权的可能;郭沫若乃作《甲申三百年祭》(《新华日报》1944年三月十九至二十二日),论述李自成顺政权的成功因缘,鼓舞中国共产党,并总结大顺失败的历史的原因,有意以此历史教训,作为警惕。此后,这本书一直是政治人物讨论如何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进而长期执政的主要课本,是中国共产党人讨论寻求史学如何与现实结合,为现实服务的经典。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国民党极大的反响,《中央日报》于三月二十四日发表《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抨击《甲申三百年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四月十三日,该报又发表社论《论责任心》,责难这篇文章“渲染着亡国的怨望和牢骚”,稍后重庆独立出版社还集结这些讨论《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编为《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它》(1944),“供防毒、消防之用”。《甲申三百年祭》虽是一篇讨论李自成进京与崇祯殉国的文章,却因文章与现实的紧密结合,而成为国共两党斗争的工具。

③ 吴晗在《朱元璋传·自序》(三联书店1965年版)说道:在写作1949年版的《朱元璋传》时候,因痛恨“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而“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吴氏后来接受毛泽东的修改建议,1956年版的《朱元璋传》,第五章《恐怖政治》已经不见,代之以增加的第六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肯定朱元璋的功绩,认为:“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是为明朝前期的繁荣安定局面,打下了基础,是应该肯定的。”

④ 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有少数学者开始试探明代后期经济与社会的新发展,他们从检讨社会史论战引发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出发,批判需靠外力才能打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谬说,尤其反对日人秋泽修二所谓“皇军武力”会“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的说法。于是在明清社会经济史料中寻找手工业与商业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与生产关系”的“萌芽”,来证明在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前,中国社会经济不是停滞的,已经出现重要的变化。1937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黎明书局)首次提出明末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认为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思想反映了“萌芽状态中的市民思想”,“明清之际,布尔乔亚的都市萌芽”的说法,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之一个重要因素。1940年,吕振羽更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具体指出明清之际,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接着在1948年出版的《简明中国通史》(光华书店)中特立一章《由封建经济的复兴到崩溃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进一步论述。

人不同,除坚持求实求真,不曲学阿世,不有意地断章取义,不刻意误解误读史料外,还得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客观态度,要较全盘地了解史实。如能坚守这个伦理,减少时空氛围所加的干扰,或许可以对明代,这一个“多重性格”的时代和“多元结构”的社会^①,在评价其历史地位时,能有和而不同的共识,而得出不会因时、因人、因地而异的终极结论。

(台湾东吴大学历史学系)

①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王天有、高寿仙:《明史——一个多重性格的时代》,三民书局2008年版。

明文化:未完成的近代化转型

商 传

人们一直都把中国历史文化称作传统文化,从孔夫子到末代皇帝、从儒家经典到百姓穿衣吃饭都可以放到“传统文化”这个大概概念里面;其实,在“传统文化”这个大概概念之下,其中所包容的文化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仅以中国历史进程为尺度,每一个时段的文化现象虽然有一脉相承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差异,使人们很容易从中感受到时代文化特征。不过,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传承者有很大关系。比如,今天的北京就保留了较多的清文化传统,而南京则保留了较多的明文化传统。那么,究竟什么是明文化呢?简言之,明文化就是明代的文化。但是,明代的文化主要特征是什么,它与其他时代的文化有何异同?多年前,我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①。当时我谈到明文化的四个主要特征——时段性、层面性、地域性和中西文化交流,但这不过是明文化的几个方面,还不是明文化独有的特征。本文拟就明文化的特征略述一孔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明文化始于永乐

葛兆光在《“唐宋”抑或“宋明”》^②一文中提出,从社会思想文化角度看,宋明的承接关系似乎较之唐宋之间更为近些。我很赞成他的观点。只是这个观点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时段的历史俯视。因为,有明一代的社会思想文化现象曾经发生过相当大的变化。

明太祖在南京建国的时候,许多汉族士大夫们有一段时间是不想与新朝合作的。这无非是因为他们把虽然是异族建国的元朝视为了正统。但是,等到他们一旦接受了新朝建立的现实后,多数士大夫们便有了一种群体回归的感觉。而他们回归的,则是理想中的从宋代以来的传统。在元朝分为四等人的社会结构下,毕竟与这种传统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那么,明文化是不是就是对宋文化的继承呢?应该说,既是也不完全是。明太祖的立国,虽然未必有民族革命的色彩,但是在思想文化传承上却更注意追宗宋而不是元。对于元代的“胡风”,明太祖是决心改易的。这更主要表现在对于礼乐的追寻。在近百

^① 商传:《明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年元朝统治之后,重新追寻已经废坏的礼乐,这也便确定了宋明文化承接的模式。

从传统汉文化角度来看,明对于宋的承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虽然汉民族是中华多民族的融合体,但是明朝实际上还只能算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多民族国家,所以,明太祖的许多做法被后来的学者称为“去蒙古化”^①。因此,我们今天往往认为,明朝在诸多文化现象上更接近宋代,不过是将一些在宋代精英化的东西改变而成为大众化的东西了。

这里面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明太祖、成祖乃至仁、宣七十余年间,明代的政治状况与宋代是截然不同的。用今天的观念来说,那就是明代较宋代更突出表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状态,而且是空前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里面有两个内容,一个是中央集权,一个是专制主义。明太祖及其子孙的专制,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所有的官民都作为了皇权专制的对象。这种情况到明仁宗、宣宗后稍有转变,明中叶以后才有较大的变化。

真正的明文化是从永乐时代开始的。明太祖时代的文化风气,还是元末明初的一种文化风气。当年谢国桢教授说,明末清初的学风固然很值得讨论,其实元末明初的学风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这里我联想到的是刘基、宋濂等人,出仕明朝,成了明朝开国的中心人物。但是像叶子奇等,反浮沉下僚,甚至于得罪以死。因而有许多士大夫如陶宗仪、杨维桢、孙作等人,他们宁肯优游林下,不肯出仕明朝。因为在明太祖的严威之下,稍不谨慎,如高启、叶子奇等人就可以得到杀身下狱的大祸。……所以他们情愿老死田园,不愿与新朝合作”^②。此类由元入明的士大夫们所具的文化风气仍然是元末的文化风气,而与有明一代的文化风气不甚相同。

考《明史·艺文志》所载洪武、建文两朝士大夫有文集者,计120人。其中,于洪武朝获罪者近30人:宋濂、刘基、危素、戴良、汪广洋、郭奎、刘崧、魏观、苏伯衡、高启、杨基、徐贲、张羽、王彝、王行、袁凯、顾禄、刘驥、刘三吾、张孟兼、王翰、方克勤、吴伯宗、唐肃、谢肃、乌斯道、林鸿、孙蕡、蓝仁、任亨泰,及入永乐朝为官之解缙;辞官不受几近20人:王逢、梁寅、杨维桢、陶宗仪、贡悦、谢应芳、李祁、张昱、张宪、华幼武、陶振、赵沅、汪克宽、唐桂芳、胡翰、朱廉、陈谟、陈基、丁鹤年。建文遗臣死难者:方孝孺、卓敬、练子宁、茅大方、程本立、王艮、王叔英、周是修、郑居贞、程通、王禾余、张结、楼璉、高逊志。通计为明初文集之半。究其原由,盖因明初的文化风气不符于新朝政治之故。如《明史·杨维桢传》所记,明太祖于南京建国之时,以杨维桢为代表的江南士大夫们并无对新朝建立的兴趣,仍然故我于醉生梦死之中:

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风琶和之。食客皆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① (明)朱元璋:《大诰》序。

② 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草木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此种情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历代晚世的放荡,却无半点新朝气象。明太祖希望的乃是“网罗硕学”,是“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①。相比之下,杨维桢等人则欲行远远脱离体制的自由化之路径。

我们且不去评论明太祖朝的“文字之祸”的是非真伪。打压文化人,从而打压元末明初的学风,应是当时的事实。若以不破不立的理论解释,明太祖的所为,实为打破旧文化风气而开创新朝文化风气。令明太祖遗憾的是,真正能够称之为新朝文化的东西在洪武中并未形成,而恰恰是始于永乐而成于仁、宣的官文化及其代表风气的“台阁体”始开新朝之风。所以我认为,永乐以后才真正能算作是明文化的开端。

与明成祖最有关系的两位文化代表人物,一个是因为不肯为其起草《登极诏》而被杀的方孝孺,一个是为其起草《登极诏》而后来仍然被杀的解缙。他们被杀固然有多重原因,但他们应该算是元末明初文化风气最后的两位代表人物。伴随着他们的死,元末明初的文化风气也便荡然无存了。姚广孝是一个特例。他虽然也属于元末明初的文人群体,但是他毕竟既是“靖难”功臣同时又是出家人,既可以成为政治核心人物,又可以成为看破红尘的不近世事的高僧。所以,这位兼通佛、道、儒的高人除去主持了《永乐大典》修纂,并没有成为文坛的领袖。

二、明前期的主体文化是官文化

明文化是既追宗了宋文化,同时更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之大成的官文化,是以此为开端的中國皇权文化的代表。不过,明文化到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无论是哲学思想方面的王学、泰州学派,还是李卓吾以至东林和明末的理学;无论是复古的前、后七子,还是公安、竟陵派,以至明人小说、民间的时调;无论是绘画,还是戏曲,都与明前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时期的明文化,便从官文化主体,转而形成了民间社会文化主体。尤其是适应城市需求的文化产品,已经看不到一点明初官文化恢宏一时的影子了。

与中国历史上历朝不同的是,明朝中叶以后发生了社会转型变化,所以明朝自身就具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明中叶以前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一个巅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特点是以帝制为代表的强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等级制度,经济特点是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男耕女织式的自然经济。明中叶以后则发生了社会转型的变化,应该是属于中国近世社会的开端时期,或者叫做萌芽期。这个时期的政治特点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有所松动,传统的等级制度有所变化,经济特点是商品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这种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特点,也就必然会造成明代文化的两个不同时段的特点。我一直认为,“明代的文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而且体现了中国传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儒林传序》。